



夕陽寄語

于家駒自署



全

本書是千家駒先生最新的論文結集。

作者是著名的經濟學家，長期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問題，參與中共建國初期一些國民經濟大政方針的制定，又經歷多次政治運動，是中國當代歷史的一個見證人。

本書文章大多是作者就中國當前的政治、經濟和文化等多方面問題提出的看法，見解獨特，發人深省。

大膽直言、見微知著的同時，也有憂國憂民的情懷，由這些文章，也可見到老一輩知識分子的風範。

ISBN 962 257 850 0



9 789622 578500

PUBLISHED & PRINTED
IN HONG KONG

H.K.\$ 60.00



夕陽昏語



夕陽自署

夕

封面：作者近照（86歲）

夕陽昏語・千家駒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~115號晉爵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
電話：2528 3671 圖文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（門市部）

電話：2528 5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：2861 1541

承印：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圖文傳真：2558 1902

發行：利通圖書有限公司（港澳）

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

電話：2303 1010（13線） 圖文傳真：2764 1310

© COSMOS BOOKS LTD. 1995

（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）

一九九五年・香港

子字物 作品

家國心事 政經卓識



天地圖書

出版

港九各大書局有售

夕陽昏語

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
昏者黃昏也，但也不作糊塗
解，究竟是衆人皆醉而我
獨醒呢，還是舉世皆清而
我獨昏呢，讓讀者來判斷吧。

夕字躬自題

時年八十有六

自序

「防民之口，甚於防川，川壅而潰，傷人必多，民亦如之！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，爲民者宣之使言。」

——「呂公諫厲王止謗」

我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，息影洛杉磯三年之久，九二年返回國內。文人積習難改，兼以目擊時艱，對社會上一些積弊，如骨鯁在喉，不吐不快，所以先後發表了數百篇政經論評，散見於海內外報刊。後加以蒐集整理，在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了《去國憂思錄》、《海外遊子聲》、《逝者如斯夫》、《歸去來兮》。又在美國八方文化企業公司出版了一本《千家駒讀史筆記》，在台灣時報出版社出版了一本《從追求到幻滅》。在六、七年中出版了六本著作，雖然算不上甚麼「豐收」，但也堪以自慰了。我想，假如我在八九年不移居海外，繼續當我的全國政協常委，做一個「政治花瓶」，我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收穫的，此真所謂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」了。太史公曰：「古者富貴而名磨滅，不可勝記，唯個儻非常之人稱焉。」司馬遷遭李陵之禍，幽於縲紲，「所以隱忍苟活，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，恨私心有所不盡，鄙陋沒世，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。」（見《報任安書》）。他又說：「蓋文王拘而演周易，仲尼厄而作春秋。屈原放逐，乃賦離騷。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。孫子贖腳，兵法修列。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。韓

非囚秦，說難孤憤。詩三百篇，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故述治事思來者。」《史記》一書，彪炳千古，有漢一代，經歷四百多年，帝王將相，不下千百，有幾人還留在我們的腦際，而司馬遷之名，卻與日月同輝，名垂千古。正如有清一代，多多少少狀元宰相我們都記不得了，但是寫《紅樓夢》的曹雪芹，著《聊齋誌異》的蒲松齡，卻至今婦孺皆知。

像我這樣一個渺小的人物，豈敢與先賢相比，但是我所處的這個時代，卻真是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一个轉型期時代。自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社會主義真是一浪高過一浪，淹沒了地球的一半。二次世界大戰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成立，再加上東南亞的北朝鮮、越南、柬埔寨、拉丁美洲的古巴，以及義大利、法國共產黨在國會中的強大力量，看起來社會主義真如旭日之東升，沛然而莫之能禦的世界潮流。而資本主義則日薄西山，奄奄一息了。我也是在這個潮流中隨波逐流的一個小人物。我弱冠之年即醉心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，一九二五年曾一度加入改組後的國民黨與共產黨，成爲「跨黨份子」。一九二八年在北京被張作霖政府所逮捕，北伐勝利後，我亦被釋出獄，自後雖未再加入國民黨和共產黨，但我始終追隨於中國共產黨之後，爲中共的同路人，甚至還以黨外的「布爾什維克」自居。我鑽研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，投身於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，數十年如一日。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，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。我終以爲我畢生爲之奮鬥的社會主義實現了，真是如癡如狂，參加了天安門的開國典禮。我以一介書生，也當了新中國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官（局長）。當建國初期，中國共產黨的確是勵精圖治，高級幹部，一塵不染，在短短三年之內，統一了財經，消滅了國民黨統治時代遺留下的惡性通貨膨脹，肅清了舊社會的煙（鴉片）、賭、嫖等惡習，

社會風氣爲之丕變，道不拾遺，夜不閉戶，令全世界刮目相看。當時許多大陸知識份子的精英（包括像陳垣、梁思成、馮友蘭、朱光潛、金岳霖、葉聖陶、巴金、冰心等等）確乎認爲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，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、光榮、正確的黨，舊社會的知識份子需要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，他們對共產黨的心悅誠服，對毛主席之五體投地，我認爲是真的，不是偽裝的。我是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的，民盟是一個以高級知識份子爲主要成員的團體，而我又是民盟中的「左派」。六十年代，民盟在北大設了一個小組，參加的多爲北大的盟員，其中不少是北大的一級名教授，如馮友蘭、朱光潛、童第周、江澤涵、朱德熙、吳組湘、王瑤等人，民盟中央派了胡愈之、李文宜和我參加這個小組（胡、李均爲資深的共產黨員，只有我不是），小組每周開會一次，會後即在北大聚餐。這個小組維持了三四年之久，我不能說他們的表態都是假的，的確確，我們都自認爲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，應該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觀。在反右派運動中，許多知識份子的精英被劃爲右派，民盟除了羅隆基、章伯鈞所謂「章羅聯盟」以外，還有費孝通、錢偉長、潘光旦、吳景超、曾昭掄、儲安平、沈志遠等等，我也認爲他們的確有「反黨」「反社會主義」的言論，我是參加批判「章羅聯盟」的積極份子之一，與吳晗一樣，以「進步」自居，我還當了民盟整風會議的秘書長。在反右以後，中共又搞了一次所謂「交心」運動，要大家交出心來，要交「黑心」，不要交「紅心」。就是說，要把心靈深處對共產黨不滿的心裏話說出來，交的「黑心」愈多，表示你愈進步，這真是典型的引蛇出洞。等到第二次搞政治運動時，中共就用這些交心材料來整你，這是你自己親口說的，白紙黑字寫在上面，你還有甚麼可說的呢？在交心運動中我又是積極份子。我不但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作了動員報告（我任學院的

副院長）而且還做了典範，說我自己也有對共產黨某些不滿之處，被利用去各民主黨派當典型，說像千某某這樣進步的「左派」，都還有黑心，難道你們就一點也沒有嗎？我還以被利用而沾沾自喜。總之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，我都是積極份子。在批胡風，批梁漱溟，批馬寅初，批胡適，批俞平伯的大批判中，我雖然沒有寫過甚麼文章，一則因為我不是搞文藝的，所以對批胡風，批俞平伯不感興趣。二是我對馬寅初的控制人口理論內心是同意的，但沒有公開表示支持。至於胡適，對我有知遇之恩，所以在批馬、批胡運動中，我也沒有寫過一個字。

在文化大革命以前，我對毛主席一直是崇拜敬仰的。雖然在文革以前，我對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已有些省悟。首先，在反右派運動中，我雖然沒有被劃成「右派」，而且還是反右中的積極份子，但是有一次我在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大會中發言。我說，我們不應該全盤否定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文科學。因為按照蘇聯的教條主義理論，資本主義國家只有自然科學是「科學」，因為自然科學是沒有階級性的；而社會科學則全是庸俗的社會學，因為社會科學是有階級性的，所以當時我們全面否定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科學，認為「一無是處」。我說，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科學也有可以繼承的地方，例如國際公法，比較憲法、歷史、文藝，這些都是文化的結晶，難道不值得我們學習嗎？我這話是在一九五五年說的，當時「反右」尚未開展，我的發言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。等到一九五七年「反右」開始後，中國科學院把我的發言記錄整理出來了，他們認為這是典型的「右派」言論，是要為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。科學院要我劃為「右派」，但劃右派是要本單位同意的，我工作的單位是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，我的單位黨委不同意，這事就算過去了。

又有一次是在一九六二年，我和五位全國政協委員也是經濟學者（陳翰笙、沈志遠、彭迪先、吳半農、關夢覺）在全國政協大會上，提出三點建議：（一）糧食過關應該是指全國而言，不是要求每個人民公社都要糧食過關。如果要求每一人民公社都要糧食過關，那就會把經濟作物，如棉花、茶、煙葉等擠掉了。（二）我們不同意當時提出，工業要就地取材，就地生產，就地銷售的口號，認為如果那樣做，那麼上海、天津、青島這些輕工業基地的原料那裏來呢？（三）我們主張開放農村集市貿易以活躍市場。這個發言稿是我起草的，而按姓名筆劃我又排在首名，那天也是我上台代表我們六人發言的，那知這樣一個不過是經濟學ABC的發言竟被視為是「反黨」「反社會主義」的，是要「挖社會主義經濟的牆腳」，是要搞「資本主義復辟」。到了第二年政協開大會時，受到了不指名的批評，不過因為我是民主人士，沒有點我的名。其實一點也不奇怪，毛澤東的理想是把中國推上原始共產主義的道路，要消滅商品生產。甚麼「就地取材，就地生產，就地銷售」完全是自然經濟的觀念，它與現代化的思想真是南轅北馬，一個是地北，一個是地北，我受到批判也是應該的。

還有一次是在「反右」以前，民盟有五位同志（曾昭掄、錢偉長、華羅庚、童第周、千家駒）起草了一份「對於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意見」，送給國家科委做參考。這份意見書中提出關於保護科學家的問題。我們說，老的科學家不多了，（一）建議要保證他們有六分之五的時間從事科學研究工作，不要兼職太多，（二）建議對那些有領導科學研究能力的科學家配備一定的適當的助手，科學家的助手，應由科學家自己選擇，（三）建議對科學研究所必需的圖書、儀器、試驗器材、標本等等盡可能予以充實，（四）認為我國的保密制度過嚴過死，建議除軍事、外交以及新發明外，對於科學家、教授不

要過於保密，（五）建議在高等院校設置研究專款，以保證研究計劃不會因經費不足而不能完成，並設立科學基金，作為機動之用。科學經費應允許跨年度使用，（六）凡沒有就業或已就業而學非所用的科學家，建議為他們安排歸隊。

在社會科學方面，也提了三條意見：

（一）由於國家工業化的需要，重視自然科學是必要的，正確的，但社會科學並非不重要，也應該有相應的發展。（這是針對當時「重理輕文」而說的。）

（二）要發展社會科學，應改變對舊社會科學的態度，那種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根本沒有社會科學之可言是不對的。

（三）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另一偏向是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當成客觀規律，建議社會科學應重視調查研究工作，應該研究客觀規律，而不以宣傳政府的政策法令為滿足，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，對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見。

最後關於培養新生力量問題，「意見」提出「過去在升學、升級、選拔研究生、留學生時，有片面地強調政治條件的傾向，我們認為今後應該業務與政治並重，人民內部在培養機會上應一視同仁，對於有培養前途的青年，應該平等地對待。」

以上就是意見書的主要內容，像這樣一份意見書，在今天看來，是多麼切中時弊，合情合理，真可以說是字字珠璣，擲地有聲。然而又有誰會料到這麼好的一份意見書，竟被視為「反黨、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」。先是由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先生第一個放炮，寫了一篇「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

領」的檄文，在《人民日報》上以整版地位登出。繼着是一篇一篇的批判文章在《人民日報》《光明日報》以及各報刊上發表。在一九五七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，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、中央宣傳部部長、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竟公開指摘說這是一個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，並質問曾昭掄（時為全國人大代表）：「身為高等教育部副部長的曾昭掄，爲甚麼要反對社會主義，反對中國共產黨？」這真如晴天霹靂，令我們感到震驚，由於文件的起草人曾、華、錢、童、千五人都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（相當於各國的「院士」），其中曾昭掄、華羅庚、童第周、錢偉長四人還是名聞中外的中國第一流的科學家，區區的我，又是中國民盟著名的「左派」，如全部打成「右派」，未免影響面太大，所以他們決定保護華羅庚、童第周、千家駒三人過關，僅把曾昭掄、錢偉長兩人劃爲「右派」。當時曾昭掄是高等教育部副部長，錢偉長是清華大學副校長。打成右派後，當然把他們的職務全部免了。

爲甚麼郭沫若第一個放炮呢？因爲郭是中國科學院院長，而我們五個人都是科學院的學部委員（即院士）。郭奉命放第一炮，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的。現在這個科學綱領早已「平反」了，中共中央於一九八〇年發了正式的文件說，一九五七年關於我國科學體制改革的意見書「是有益的」，「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」。

現在我不是想算舊賬，我現在想提出來的問題，爲甚麼這樣一個合情合理的意見書，竟會被當成「反黨反社會主義」的毒草而受到全國的炮轟？爲甚麼我和陳翰笙等六位經濟學者不過是經濟學ABC的發言，會被當成要挖社會主義經濟的牆腳，此外，在劃右派中，許多人不過說了一兩句很平凡而僅僅是常識的話，例如我有一個朋友說：「美國的經濟還是比中國發達。」這就被認爲崇美而劃成「右

派」。又有一朋友說，學校裏不應廢除英文（有一時期，中國各大學都禁止學英文而改授俄文）。因為科學文獻中，百分之七十以上還是用英語的，這也認為是放毒而劃成右派。在今天看來，這不是荒謬而可笑的嗎？

在共產黨統治下的新中國，有些事情的確是使人難於理解的。是非顛倒，令人難以置信。秦二世時指鹿為馬，鹿與馬究竟還有相似之處，而在中國大陸，即指老鼠比牛還要大，也沒有人敢說一個「不」字。八十年代我曾經寫過一篇小品文題為「羅剎國」。「羅剎海市」是蒲松齡《聊齋誌異》中的一篇寓言小說，說是一個名叫馬驥的美男子，因為他長得漂亮，故有「俊人」之稱。有一次他隨人飄海到一個羅剎國，其人皆奇醜，見馬至，以為妖，紛紛逃避。後來一打聽，才知道這個羅剎國最重人的容貌，最美的做大官，次美的做縣官。但他們的美醜標準則與我們中華相反，以奇醜為至美，以至美為奇醜。所以做丞相的「雙耳皆背生，鼻三孔，睫毛覆目如簾」，其餘的也都奇形怪狀，猙獰可怖。地位愈低的，醜亦稍減，因此，中國的美男子，在他們看來，就認為奇醜無比，「謀奔跌蹶，如逢怪物」了。有一天，馬驥以煤炭塗面，作張飛狀，他們就認為漂亮得很，可以去見國王了，還有人問他：「何先嫌而後妍也？」

這當然是蒲松齡的識世寓言，但在現實社會中，這種以美為醜，以醜為美，是非顛倒，黑白倒置的事情卻在新中國的現實社會中頻頻出現了。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許多一向支持中共，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文化界著名人士，如老舍、吳晗、翦伯贊、金仲華、范長江甚至共產黨員如周揚、夏衍、田漢、陽翰笙、鄧拓等等忽然一下子變成「反共老手」。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，黨內第二號人物的劉少奇

一下子變成「叛徒、工賊、內奸」。賀龍、彭德懷這些身經百戰，為中共取得政權建下不世功勳的元帥，也一下子變成了「軍閥」、「野心家」。這些還不說，連歷史上的正面人物，如抗金的岳飛，因反清而被殺的烈士秋瑾，也一個一個被挖了墳，掘墓以示衆，說他們都是歷史上的罪人。本來，歷史上是沒有絕對的是非標準的。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勳，但從清皇朝的立場看，則是竊國大盜。歷史上有許多入人於罪的理由，所謂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」。由於社會制度之不同，道德觀念、意識形態、價值標準等等之差異，每一社會都有每一社會的道德標準。但是古今中外，總沒有聽說過誰工作好、業務精會成爲一條「罪狀」的。在「文革」期間卻正好如此。許多名作家、名演員、名大夫、名學者之所以被批鬥，就是因爲他們有「名」。老舍被批鬥，因爲他是名作家，小說寫得好。馬連良被批鬥，因爲他是名演員，京戲演得好。翦伯贊被批鬥，因爲他是著名歷史學家，是「反動學術權威」。其餘如評劇演員新鳳霞、粵劇演員紅線女、電影演員趙丹以及一些大醫院的名大夫，大學的名教授、名科學家、名工程師，其唯一的罪名就是因爲他們有「名」，成了「家」。業務精，技術好，所以挨批挨鬥。各大醫院的主任大夫都被打成「牛鬼蛇神」下放搞醫院衛生，打掃廁所，而由不懂醫術的護士來當領導，「專」著名大夫的「政」。中小學校老師教書教得好就被不愛唸書的壞學生所批鬥。

此外，社會秩序，愈亂愈好，盜竊成風，流氓橫行，這叫做有「階級鬥爭」是好事。如果「夜不閉戶」「道不拾遺」，那就是「階級鬥爭熄滅論」，走修正主義道路。

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「清官」。要是有的話，清官也比貪官還壞。因爲清官緩和階級鬥爭，模糊人民的鬥爭意識，是「最壞的階級敵人」。而貪官或臧官卻能激化社會矛盾，鼓勵人民的鬥志，所以他們

的貢獻比清官更大。

工廠本來是應該搞生產的，但在「文革」期間，抓生產也成為一條罪狀，叫做「唯生產力論」，是以「抓生產，壓革命」，要受批判。

學術機關本來是搞研究工作的，但在「文革」期間，中國科學院某些研究單位，工宣隊竟下令，誰要做研究工作，誰就要犯「政治錯誤」。

學校本來是求知識的，在文革期間，批評了「智育第一」論，無論老師或學生，進圖書館、實驗室，就是「白專道路」。

鼓勵小學生造老師的反，美其名曰「反師道尊嚴」，於是小學校的門窗都被打爛，叫發揚造反精神，老師如加以干涉，便要被批被鬥。

白卷大王張鐵生，投考瀋陽農學院，交了白卷，在白卷上寫上「我因為參加了三大革命運動，所以交了白卷」。這一下子成了「白卷英雄」，不但當上全國人大常委，後來還當上了他考不上的瀋陽農學院的黨委書記，成了該校最高領導。如果「四人幫」不倒台，還準備請這位「白卷大王」做中央教育部長。

如此等等，如果不是親自經歷，過若干年後，讀者準以為是我憑空捏造的天方夜譚，或者如蒲松齡那樣的寓言小說。

這難道不是典型的「羅剎國」嗎！

有人說，這些都已經過去了，文化大革命早已被徹底否定，而且文革時代是「瘋狂的時代」，文革

的人是「發了瘋的人」。這是「文革」鉅子陳伯達親自說的。瘋狂的時代早就過去了，爲甚麼還要算舊賬呢？

我不是要算舊賬，我是提出一個問題，就是這種違反情理、違反常識、顛倒是非的怪事怎麼會在中國大陸上產生的？而且延續了十年之久？毛澤東說，文化大革命是一史無前例」的。的確，這種顛倒黑白的事在中國一部二十四史中是從所未有過的。

「文革」所造成的浩劫不說，那麼「文革」以前呢？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，一九五五年的駁馬寅初，以及一九五三年的批梁漱溟，一九五五年批胡適，批俞平伯，批武訓……請問那一次是正確的呢？有人說，現在不是大部份已平反了嗎？不錯，絕大部份是平反了，問題是爲甚麼會發生這許多冤案或冤獄。共產黨不是自稱是「偉大、光榮、正確」的嗎？既然是「偉大、光榮、正確的」，何以冤案冤獄之多，會超過中國歷史上二千年的紀錄。

我追隨共產黨達半個世紀以上。爲了追求共產主義的實現，中國成千上萬的革命志士，不惜洒熱血，拋頭顱，坐監牢，受酷刑，可歌可泣，才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。中共革命領袖的艱苦卓絕，鋼鐵般的毅力，百折不屈的精神亦光如日月，但爲甚麼中共在取得政權以後，竟發生了這樣的變化？舉例說，在共產黨處在地下工作時代，許多革命青年，進步知識份子千方百計要參加共產黨，其目的想做官發財的恐怕一個也沒有，因爲那時候做一個地下黨員，非但發不了財，做不了官，還要冒着坐牢殺頭的危險。但是今天許多削尖腦袋，申請入黨的，有那一個是真正爲共產主義的理想而奮鬥的？又如在解放初期，共產黨高級幹部的清廉自律，一塵不染，兩袖清風，真也是中國歷史上所未見的，不要說高級幹